

苏修尊儒反华 言论摘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修尊儒反华言论摘录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哲学研究室编
外国问题研究所

~~~~~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批判引用时请用原出处。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修尊儒反华言论摘录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哲学研究室编
外国问题研究所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0,000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2·154 定价 0.20元

(内部发行)

编 者 的 话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为了加紧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疯狂地反华反共反革命，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大肆吹捧儒家，攻击法家，对我国进行恶毒的诽谤。

他们伪造历史，把孔子说成是“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的代表，完全抹杀了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实质。他们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吹捧孔子是“理所当然被尊为中国至圣先师的思想家”；把孔子的“仁”说成是“博爱”、“正义”和“人道主义”；胡说孔子“反对把君权绝对化”，孟子主张复辟井田制，是“儒家真正关心千百万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的命运”。他们把为没落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孔子的教育思想，更是捧上了天，说什么孔子“破天荒的第一次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创办并领导了中国的第一所私学。一切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可以来此上学”，这

样的教育,其目标是“给自己的学生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仁和义),以便使他们当官的时候能成为德行的模范和关心人民”。

他们在攻击和诋毁法家的同时,鼓吹“儒法合流”,抹杀儒法的对立斗争,抹杀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和保守的阶级界限。胡说法家和儒家都是“崇古”、“法古”的,“在这方面,法家作为传统的维护者,并不比儒家逊色”;儒家和法家这两派,“在其方法上是对立的,但都想达到一个目的,即为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思想作论证”。特别反动的是,苏修叛徒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从历史唯心论出发,利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法家公开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言论,故意大肆渲染法家的所谓残酷性和不人道,以此来掩盖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用心。他们同历来的反动统治者一样,把沿着法家道路前进的秦始皇咒骂为“暴君”、“历史上极端残忍的皇帝”,以诽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总是不断地抬出孔子,借助孔子的亡灵来为他

们的反革命复辟服务，“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辩护”。叛徒、特务、苏修豢养的走狗王明，就是拜倒在孔子脚下高呼“堂堂夫子”的奴才；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带头到曲阜“朝圣”，并抛出鼓吹“孔孟之道”的“修养经”；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反动家伙，但也居然装模作样地谈论什么孔子、孟子、哲学、历史，大肆贩卖孔子的所谓“德”、“仁义”、“忠恕”等黑货，为儒家大唱赞歌。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孔子在中国的徒子徒孙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和孔子在苏修的徒子徒孙勃列日涅夫集团是一丘之貉，都是一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无耻叛徒。尽管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抬出孔子的亡灵，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子，表达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而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的彻底被粉碎，同时也宣告了苏修妄图通过他们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的彻底破产。

为了响应党的十大提出的“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战斗号召，我们从苏修部分报刊、书籍中摘录了尊儒反华言论，编成这本小册子，供研究、

批判之用。由于时间匆促,编译工作可能存在缺点,希望读者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哲学研究室
外国问题研究所

1973.10.

目 录

吹捧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1
宣扬孔孟的经济思想·····	25
吹嘘孔子的教育思想·····	30
反对法家,恶毒反华·····	34
咒骂秦始皇,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7
攻击我国当前对尊儒反法思潮的批判·····	60

一、吹捧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孔子是独特的伦理政治学说的创始者。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给予了深刻的影响。在许多世纪中,他的学说都被看作是大多数中国哲学学说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孔子的名字是同许多世纪的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发展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Ф.С. 贝柯夫:《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起源》,苏联科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俄文版第九〇页

在近两千年间,《论语》与其他儒家学说的经典一并形成了中国人民的社会意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论语》便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传统体系和社会心理。

В.А. 克里甫佐夫为《中国古代哲学(文选)》(一九七二年俄文版)一书中《论语》所写的前言

关于儒学，著述很多，极为浩繁。汉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都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中国文明之所以是中国文明，正是儒学使然。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的结构对人们的影响，了解它的宗旨和珍贵意义，就会得出结论：正是儒学反映了旧中国的基本生活准则。……

儒学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形成的呢？这个学说何以变成为官方的思想体系，什么原因使它能存在近两千年？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是儒家的鼻祖。他生在社会和政治发生大动荡的时代。数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家长制氏族的规范和传统遭到破坏，在兼并战争中氏族贵族消亡了，诸侯政权加强了，他们凭借当时形成的行政官僚机构，靠官宦阶层进行统治。在已经固定下来的种种传统遭受严重破坏的过程中，许多道德伦理准则也受到严格的再评价。亲族互相尊敬和兄弟般的团结，在斗争中被抛弃了。起而代之的是残杀和收买，敲诈和变节，仇恨和残暴。《春秋》据传说出自孔夫子手笔，写的是公元前八——前五世纪的事，正象这部最古老的编年史所表明的，当时的国君和王亲国戚、贵族和大臣竞相追逐权势利祿，肆无忌惮，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亲人，以至自己的父亲。古代基础的崩溃，贵族和

统治者的内讧，官吏的叛逆和贪得无厌，老百姓的受苦受难，引起这位哲学家的严厉批评。客观环境促使孔夫子提出某种能够与现存观点相对抗的新观点。但是，为了使这种否定在道义上具有存在的权利，并获得必要的社会力量，它必须凭借公认的权威。孔夫子从远古半神话的楷模中找到了这种权威。在同当代事物进行斗争中，力图凭借古代传统来影响当代人，使向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但儒家的特点在于：这种征古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大得惊人。随着时间的演进，实际上变成了目的本身。古时候，依孔夫子看，统治者是英明的、能干的，官吏是大公无私的、忠诚的，人民是安宁的，孔夫子死后数百年，这种对古代的敬仰成了国家社会生活基本的和经常起作用的推动力量。

孔夫子批评自己的时代，抬高过去的时代，在非今颂古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完人”的理想——君子。具有高度道义感的君子有两个最重要的品德：仁和义。“仁”这个概念，孔夫子解释得非常广泛，它首先包括谦虚、公正、审慎、大公无私、爱人等等。“仁”是一种崇高的、几乎不可及的理想，是只有古圣先贤才具有的全部美德，后人应当奋力以求之。不过，对于真正的君子说，只有“仁”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义”，“义”出自一种

内在信念，即确信应该如此这般地行动，而不是别的行动。“义”是一个人由于自己的美德而自动承担的一种道德义务；它跟卑鄙的利是相矛盾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的概念包括对统治者的忠诚，学习和理解古圣先贤的义务等等。把“仁”和“义”结合起来，就使人有可能成为君子。这位哲学家的箴言集《论语》，把君子奉为高尚、正直而诚恳、直爽而冷静、一切都看得出、一切也都明白、谨于言慎于行的人。他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少之时，戒之在色，及其壮也，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真正的君子对于饮食、财富、生活舒适和物质利益漠然置之。他毕生献身于崇高的思想、为人们服务、探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总而言之，孔夫子的“君子”是个抽象的社会理想，是有教益的“各种美德的综合体”。随着孔子学说的威望和影响的增加，这个抽象的理想的人日益变为必须效法的师表，所有的人，特别是从汉代（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三世纪）起就开始以儒学治国的士大夫，都努力向着这个目标接近。当然，到汉代，这个理想已发生了许多变化。

可以认为，孔夫子是真心诚意地想造就出理想的、道德高尚、能对周围不公平现象作斗争的“有美德的”人。……

孔夫子所提出的社会理想，乃是他所说天下（即中国）应有的那种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简明地表述在这一句名言中：“父父，子子，君君，臣臣”^①。让世界上一切纷乱的事有秩序，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安分守己。有这种秩序的社会应基本上由两种人构成，即上等人 and 下等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以自身劳动供养统治者。这样的社会制度，无论是孔夫子还是儒学的第二个大师孟子（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年），以及所有他们的门徒，都认为自古圣先王以来就是永恒不变的。按照孔夫子的理论，社会之划分为上等人 with 下等人，其基本标准不是门第与出身，而是个人修养成理想君子的程度。这种标准在形式上为每个人开辟了“向上的途径”（孔夫子矜持地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并不是偶然的）。但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在士大夫（君子）阶层和平民之间隔着一道十分严峻的难于克服的社会障碍——“方块字之墙”，在中国历史的几乎全部进程中，这堵墙也就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礼记》中特别规定，“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即使通文理有教养的候补大夫中间也有出身于小人者，这也毫无改变。因为一旦受教

① 原文如此。——编者

育和有儒家的教养,他就成为儒家所提倡的那种永世不变的制度的可靠支柱了。

孔夫子和孟子都宣称人民的利益是治国的最终和最高目的。孔夫子曾严厉谴责他过去的弟子冉求(“非吾徒也!”),因为冉求在一个大采邑为宰时,向农民征收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孟子教导说,国家由三个最重要的成分组成,民居首位,社稷次之,君主占第三位。但同时儒家又确信:人民自身不能得到自己的“最高利益”,不受有教养的儒家统治者的管束,他们是怎么也不行的。……

……………

上述有关儒学……社会政治和伦理的这些最重要的根本原则,乃是儒学的主要和根本之点。正是这些原则被认为对中国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儒学由一种哲学变成了官方理论,其使命是充当已经形成的社会制度的精神支柱,……儒家在改变古代典章、传统,使之适合于发达的社会机体的各种条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不能不承认这些工作相当独出心裁,具有充分的创造性。儒家学派中的许多人一生都献给了哲学教师职业,编辑了不少古代作品,……校订出《书经》、《诗经》、《春秋》等等。正是在儒家学派所改编的这些著述中收集了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

所有的最古老的史料，……后来历代中国人也正是从儒家的著作中了解中国古代的。因而，阅读和研究中国古书似乎就是明显地宣传儒家学说。此外，儒家的成功，还在不小的程度上得助于：这个学说基本上是建筑在略有改变的古代传统之上，建筑在伦理和祭祀的习惯规范之上。儒家诉诸受过父权制氏族传统教养的“真正”中国人那种极其细腻而又富于同情感的心弦，从而取得了他们的信赖，这首先和主要是由于：儒家出来支持真正中国人所心爱的保守的传统主义，主张回到“美好的古代”去，那时税收较少，人们生活得更好些，官吏比较公正，统治者也比较英明。总之，在战国时代（公元前五——前三世纪）的条件下，中国各种哲学学派和思想体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家学派从它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上看，在当时可占第一位。但是，儒家学派所倡导的管理国家的方法在当时还没有得到公认。当时影响很大的法家在这方面成了儒家的劲敌。

.....

为什么正是儒学取代被推翻了的法学的地位？为什么儒家的理论得到了发展？这里有很多因素：儒学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它倡导尊重传统（崇拜祖先），推崇道德和人人关心的“善”、“恶”概念。不过，在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看来还是孔子描述的社会理想和社会制

度，这种社会理想和社会制度是以绝对服从王权（王权必定与英明、长上等等相结合）为基础的，所以成了对巩固帝国非常有用的东西。儒学之变为正统思想，这是儒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帝国的统治者们对改革了的儒学十分满意，而这种官方的支持又促进了儒学的广泛流传，使它的规范不仅变成必须遵守的框框，而且变成了“真正中国”的象征。实际上，这意味着：每一个中国人，从他出生到他所受的教育，都使他必须成为儒家的信徒。这当然不是说他要了解儒学的全部教义，而是指每个中国人从他出生后，在生活、言行、待人接物、恪守家庭和社会礼节上，处处必须以儒学作为生活的准则，当作祖辈传统。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可以了解另外一些东西，也可以成为道家、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但是，不管信仰如何，在他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言谈等方面，经常下意识地反映出已经成为中世纪中国生活方式和人的关系的儒学思想来。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不久以前，甚至那些曾经公开猛烈反对儒学的人当中，也还有很多人仍然背着儒学教育的沉重包袱。

.....

……儒家学派精确地叙述了、记载了古代人民的习俗和传统，解释它们，并且赋予它们一定的色彩。这些准则成了群众的财富，群众很容易理解这些与古代传统一致的准则，……

儒学对中国文明的全部特征的形成、对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儒家的许多有教养的理论家和文官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既然儒家著作是数世纪积累下来的和唯一有价值的智慧的高度结晶，那么，凡是能读书识字、能阅读这些经书、能深入地钻研并阐述其意义的人，单凭这一个原因，就足以受到人们的尊敬。……

……………

……正是对地方政权的滥用，一向成为大多数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但在士大夫中间，有时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真诚地主张通常的典章制度能够得到真正的遵守，如不无盛名的海瑞，就是这样的人，他力图模范地治理政事（反对贪污、维护农民受践踏的权利等）。因此，在他们本人去世和他们的事业湮没以后，便产生许多有关他们的传说，而正是这些传说支持着民间对贤明正直的士大夫的崇拜。

……………

儒学，作为包罗万象的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只是在